

本原的狂想
哲学的前史与自然哲学的兴起

米利都学派

爱阿斯托斯学派

本原的追问

毕达哥拉斯「数」的过渡

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

芝诺的辩护

多元的回应

恩培多克勒的「爱恨说」

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智者的启蒙

智者运动产生的背景

智者运动的代表

自然论与约定论

大智的时代——「牛虻的叮咬」

走庄子格拉底

「牛虻的叮咬」

柏拉图的政治理想

「理想国」的设计

柏拉图的影响

大智的时代——「理想国」的设计

小苏格拉底学派

快乐的追寻

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和小认识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的贡献

禁欲的训诫

早期斯多亚学派

晚期斯多亚学派

斯多亚学派的政治智慧

怀疑的质询

古希腊怀疑主义兴起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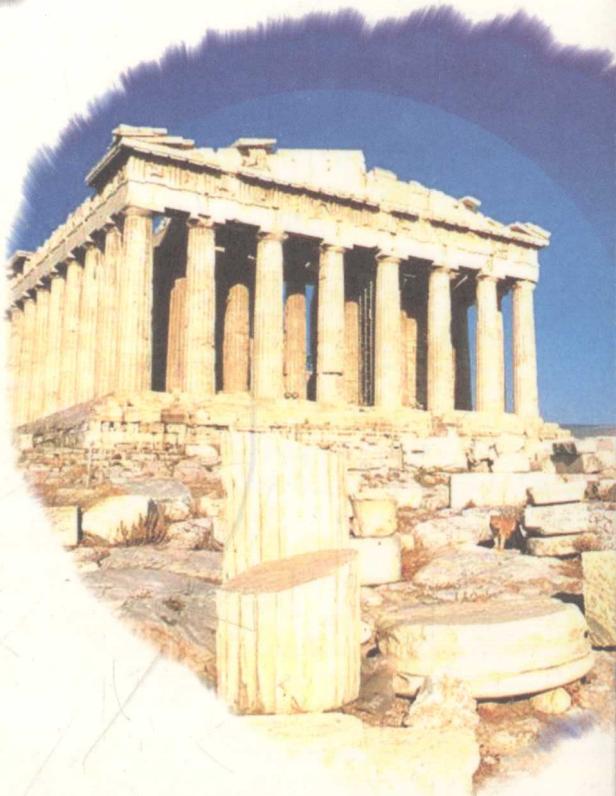
怀疑的质询

怀疑主义的影响

追尋古希腊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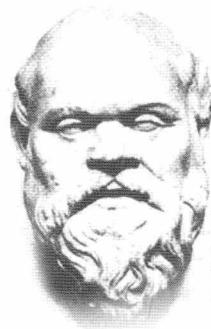
Persuit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张超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受「泉州师范学院桐江学术丛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张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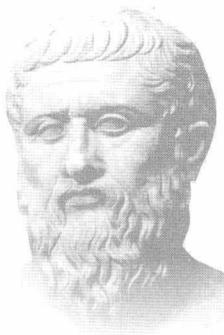
(著)

Persuit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追尋 古希腊哲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古希腊哲学/张超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615-3400-7

I. 追… II. 张… III. 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9481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沙县长安路金沙园区 邮编:3655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7.25 插页:1

字数:205 千字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公元前 800 至公元前 200 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中国有诸子百家，在波斯有琐罗亚斯德，在巴勒斯坦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印度有释迦牟尼，在古希腊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除了跨地域出现大批的哲人之外，轴心期还有这样几个特点：它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那些没有实现超越和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虽然规模宏大，但最后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进而最终成为文化的化石；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继续生活在历史之外；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花。总之，先知们所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它们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及其独特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这种角度上看，了解西方文明，轴心期的研究^①是不可或缺的。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

^① 本书研究的时间跨度大约从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长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时间跨度，但笔者认为公元前 2 世纪之后的六七百年间希腊化以及古罗马时期仍是轴心时代的某种延续，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的古希腊文明显然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古希腊哲学又是古希腊文明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因此,对古希腊哲学的追寻将有助于我们本真和完整地理解西方文明的脉络和精髓,而更为重要的是,对源头的洞察和审视将有助于消除中西文化上的隔阂和偏见,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有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朝朴学,就是没有“哲学”这一称呼。“哲学”这个词最初起源于西方,中国人最初将 philosophy 翻译成“形而上学”,因为《易经·系辞上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人认为法则是无形的,称为形而上;器用之物是有形的,称为形而下。这一对概念提出后,在中国哲学史上逐渐就被哲学家引申为表述抽象和具体、本质和现象、本原和派生物的哲学范畴。而西方哲学历来就有研究形而上的传统,因此将 philosophy 翻译成“形而上学”也表达出了其本有的一部分意义。国人还有将哲学翻译为“玄学”的,王弼《老子指略》上说:“玄,谓之深者也”,所谓玄学就是指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这种翻译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却没有涉及哲学的本质。“哲学”是舶来品,其翻译也同样是个舶来品,它最初是 19 世纪的日本学者西周对滥觞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的一种翻译,然后由我国晚清学者黄遵宪从日本介绍过来,后来这种译法慢慢取代了“形而上学”和“玄学”。“哲”在汉语中有“智慧”之意,中国古代有本字典叫《尔雅》,它里面就说:“哲,智也。”按照古希腊哲学家的解释,哲学就是一门自由追求智慧的学问。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知人者明,自知者哲”,了解别人就是“明”,而了解自己就是“哲”,这和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哲学”的翻译更确切地表达出了 philosophy 本有的含义。因此从哲学一词的来源上,“哲学”就是指西方哲学,这是西方思想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当然,我们在明确这一史实的过程中,并不包含有对东西文化进行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确实,有些西方人存在这样的观念。

黑格尔认为“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之外”，^①而梯利也认为“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理论，主要是神话和伦理学说，而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②我们知道，这是西方人以其特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来理解哲学的，他们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认为东方人没有“哲学”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西方思想、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实际上是在不同的人文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形态，它们有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及其侧重点。^③但如果戴上西哲的眼镜然后去指责和蔑视别人，就像是用西餐的角度来衡量中国人、印度人有没有吃饭一样，不仅会得出偏颇的结论，而且必然也会贻笑大方！

同时，“西方哲学”中尽管有“西方”二字，但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或空间概念，这只是指一种不同于东方文化的思想形态，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作为西方哲学两大源头的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都曾受到过东方思想的强烈影响。除此之外，在内容上中西哲学也有很多相通之处。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胡适先生的观点，他在其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④据此，他认为哲学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内容：（一）天地万物是如何来的（宇宙论）；（二）知识和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和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四）怎样才可以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那么，当西方人使用“哲学”这个概念时，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呢？在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特先生的畅销全球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98 页。

②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4 页。

③ 梁漱溟在 1921 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指出三种哲学的气质是完全不同的。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的哲学著作《西方哲学漫话》中,他认为哲学应当包含着五个研讨的领域:逻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逻辑学是探讨思维和研究的理想方法;美学是研究理想形式和美的科学;伦理学是研究理想的行为;政治学是研究理想的社会体制;而形而上学则是研究事物的普遍本质和终极根据。比较起来,中西哲学就其内容而言,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像某些西方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的思想应该被排除在哲学史之外。

如此看来,“哲学”虽是个舶来品,但是我们自己的中华文明,却从来不缺少“哲学的思想”,更不缺少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因此从广义上,我们将西方思想、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都称之为哲学也未尝不可——它们都是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对宇宙人生的一种独特解读,对自身生存的一种洒脱应对;更重要的,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它们永远都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形态中,西方哲学所采取的特殊理论形态确实不同于东方思想,在这一点上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西方的自然科学传统滥觞于古希腊哲学。世界上几个原创性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毫无疑问都具有高度的智慧,然而如果从自然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角度看,它们的作用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唯有希腊哲学才是科学的母亲”。^①如果没有从泰勒斯到原子论者这些早期自然哲学家的探索,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可能就要被推后数个世纪或者更久。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几乎囊括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各种门类,两千多年前的哲人以一种似宗教般的虔诚信仰追求智慧,他们打破砂锅问到底,从而锻造出了一种可贵的求真精神和一套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随之而来的就是数千年间各种门类的自然科学在自然哲学这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脱离并逐渐成熟。

西方哲学这个概念起源于希腊语 *philosophia*。由 *philos* 和

^①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 页。

sophia 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爱智慧也就意味着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追求智慧本身,这种求真的精神本身就蕴含了勇气、痛苦和牺牲。《圣经》“创世纪”中那个路人皆知的伊甸园神话也向我们昭示:追求智慧和真理注定将带来刻骨铭心的痛苦。但希腊的哲人却乐此不疲——他们毫不在意流言飞语,专心探讨宇宙的奥秘;他们宁愿过着贫穷的生活,与路人探究人生的真谛;他们毫不吝惜自己宝贵的生命,用鲜血捍卫真知……同时,这种求真爱智的精神也表现在古希腊哲人自我批判的风尚上,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西美尼,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学生们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态度对老师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少有“我注六经”的风气,在以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求真和批判的精神。

也正是在这种求真和批判中,论证成为必要,一套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由此慢慢得以形成和发展。在古希腊,甚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也要经过论证,论证的方式自然是多种多样,但要令人信服——投票、抽签、辩论都是一种论证的方式,而暴力却永远与论证沾不上边。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基础的存在,以暴力威胁或以欺诈的方式夺取权力的希腊人,甚至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权力是非法的。僭主就是希腊人冠以这种人的一种蔑视的专称,在古雅典,僭主的罪恶特别大,“人们不重视谁能捕获一个窃衣的小偷,而以殊荣加给那位能够诛杀一僭主的勇士。”^①每一个公民都有述说的权利,关键是在于如何说和说什么,有的哲学家关注前者,即说的技艺,有的哲学家关注后者,即说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但不管怎么说,论证的严密逻辑是必须的。在政治领域中尚且如此,在哲学领域中就更是如此,没有经过缜密论证的体系是很难获得别人认可的,更不用说去推翻和代替别人的理论了。

而在古代的中国,知识与特定的社会阶层相融合,士人与官僚相结合,于是一个新的名词出现了——“士大夫”。经济上的依赖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71 页。

性决定了学术上的政治性和附庸性，“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橥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① 也就是说，追求政治成为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而儒家在这一进程中推波助澜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②他的学生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③这些都表明学习的目的就是做官。孟子同样带领学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④曾一度为齐卿。荀子游学于齐，“三为祭酒……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⑤ 正是先秦大儒的鼓励和以身为范，再加上后来成为文化霸主的儒家的极力提倡，从此学与仕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文解字》曰：“仕，学也。”此中也可略见一斑。同时学术一旦与政治挂钩便会使其丧失本有的活力和生气，知识分子人格无法独立，何来求真和批判呢？没有求真和批判，也就没有论证严密的必要性！在这种追求学与仕一体的国度中，很难产生理论科学的萌芽。即使偶有萌芽，也会被消弭于无形之中。齐人祖冲之的数学著作，竟然在唐代失传了，因为没有人看得懂。鼎盛时期的唐朝，国家一级的教育机构可以培养学生一千多人，但其中学习自然科学的（指医学和天文学）还不足三十人。

其次，西方的民主精神在古希腊哲学中得到了完整地复制和淋漓地发挥。在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无疑为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谈到哲学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时曾说过“爱智慧”的人本身要是自由的，因为人们寻求哲学并不是为了任何别的效用，而只是为了它才追求它，因此哲学只有在一个能够容许独立思考和坚持真理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够真正扎根并得到健康

^①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36 页。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论语·子张》。

^④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⑤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的发展,事实也确实如此。反过来,至少从德谟克利特开始,民主与自由的精神就开始在哲学中得到保存、论证和深化——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中的一个个能动的原子正是雅典公民民主生活的真实写照;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人本主义命题,它高扬个人主义的旗帜,论证了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普罗泰戈拉还用神话和寓言的方式向大家说明了城邦如何得以形成以及为什么人人都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和天赋,这应该是西方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的最早雏形了;古希腊晚期的伊壁鸠鲁则更加明确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西方近代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自由等民主政治的核心观念的产生绝不是某位思想家一夜之间冥思苦想的结果,它在西方哲学的原创阶段就已经锤炼成形、卓尔不群了。

至于这种政治传统烙印在哲学家灵魂深处进而通过哲学家本人的人格魅力得以彰显的实例,则更加不胜枚举。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以民主政治活动家身份直接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并不多见,恩培多克勒是其中的一位。他无疑赢得了公众的爱戴,享有很高的声誉。据第欧根尼·拉尔修^①记载,当人们要授予恩培多克勒王位时,他拒绝接受,因为他宁愿一种俭约的生活,因此,亚里士多德称他为自由之冠。德谟克利特也以自己的言说表明了对民主的态度——“在民主制度下贫穷也比在专制制度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像自由比受奴役好。”^②当然也不是每位哲学家都拥护雅典的直接民主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但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反对民主的精神而鼓吹专制,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他们看到了雅典民主制的缺陷,于是希望能够寻找一种更好的制度来代替之,但民主与自由的理念绝不是他们反对的目标。

^① 约公元3世纪人,罗马帝国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史家,以希腊文写作,编有古希腊哲学史料《名哲言行录》(又译为《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

^②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9页。

总而言之,没有古希腊哲学对于至善的追求,也就不会有为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伟大社会科学成果,包括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关于人类社会美好蓝图的设计。

我们再回到同时代的儒家。在伦理权力化的宗法制社会背景中,儒家发起了另外一种社会运动——权力伦理化,进而为野蛮的君主专制找到了一件美丽而迷人的外衣。所谓伦理权力化就是从物质的层面压抑和取消人的自由独立,使主体丧失独立人格,而权力伦理化也即儒家的宗旨则是要从思想的层面使人自动取消主体意识,根本丧失实现自己生命价值和本能冲动的基本能力。譬如,儿子在现实中必须无条件服从父亲不仅被理解为一种秩序,而且也被解释为是儿子先天的义务,同样妻子在现实中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不仅是一种必要,也是女性先天的德性。权力伦理化使赤裸裸的权力关系变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伦理顺从,这种形而上的论证从此为铲除君主专制设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如此者,灾及其自身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②儒家因为与政治的联姻使它从一开始就漠视甚至反对人的独立和自由,从此便与君主专制形影相随。

再次,古希腊哲学把对伦理的探究同知识的追寻结合在一起,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的传统。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就是知识,知识和美德是直接同一的,因此要想追求真正的善,就必须通过理性获得对善恶的本原性知识,否则我们对人们日常所说的种种善恶的观念和学说便没有鉴别真假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在获得这些真知的基础上才能实施真正的善行。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人把道德奠定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于是道德便拥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人们对道德行为的思考以及实践就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和理性。西方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

① 《论语·泰伯》。

② 《大学·中庸》二十八。

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方式。

古代中国的传统从不认为知识是德行,所以便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古代的中国人也决不会把一种自足的、沉思的个人生活当作是人生的理想,在西方文化传统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理性思想,而在中国的儒家文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并不在于他自身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要实现,而在于他能对别人尽自己的伦理义务。一般说来,在学界很多人都把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伦理观看成是一种道德理性,然而孔子所强调的是“情理”之“理”,苏格拉底强调的是“理性”之“理”。当道德缺乏理性的训导或者说缺乏一种知识论的基础,任由情感的驱使,这种道德往往就会变成一种随意性很强的工具,成为消解社会秩序的平台,变成一种被权势者随意杀人压迫人的工具。有一个故事或许能说明儒家的道德理性。过去有个女人,三十多岁时不幸死去丈夫,于是拉扯着儿子守寡。不久便与河对岸庙里和尚私通。河上没有桥,便黑夜跳水过河幽会。女人的孩子聪明过人,长大进京便考中了状元,衣锦还乡时人们料定和尚死罪难逃,可是状元回来却只字不提往事,相反却在河上修了一座小桥,从此,他娘夜里与和尚私通再也不用跳水……多年过去,老娘过世。状元回家奔丧,人们认为这状元心地善良,想必要为和尚养老送终。谁知状元却突然下令,杀掉了和尚。乡邻皆惊,办毕丧事,状元写下一副对联:修小桥为母行孝,杀和尚为父雪耻。在权势者的手中,这种道德八面玲珑,无处不通,天下最丑恶的勾当也可以冠以最动听的美名。数千年来,那些制造无数冤祸的权势者,如树立贞节牌坊、强迫妇女缠足、网罗民女于后宫、搜刮民脂民膏等等无一不是打着孝、忠、贞、顺的道德幌子。也就是说,没有理性和知识作为基础的道德是非常可怕的。

最后,在古希腊哲学中蕴含了多元的传统,进而培育了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在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开始还是晚期,不断反思、深入研究、多元的并立和互相融合始终是其一个重要特点,也正是如此,即使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的内部仍然有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这种争论无疑是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优良传统。正是这种良好的学术生态——多元学术的并立和争论，人们才渐渐得以在沉沦中苏醒。反观中国，自儒学独尊以后，学术争论的风气便戛然而止，经学的传统就此形成了，从此对权威的解释和阐述就成为一支支使古代中国难以苏醒的麻醉剂。

其实世界各民族在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类似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沉沦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是依附性的存在，不是依附于神，就是依附于某种秩序共同体。在欧洲，人们匍匐在上帝的脚下，而在中国，人们被束缚在家族和宗法制度中。在欧洲，这个普遍沉沦期是中世纪，而在中国，则是西周直到五四前夜的漫长时期。如果说沉沦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从沉沦中挣脱束缚就成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种必要。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击碎束缚自己锁链的铁锤，而打制这把铁锤的材料就来自于古希腊。同样是从沉沦中挣脱束缚自己的锁链，中国耗费了两千余年的时间，个中的原因我们尽可以去寻找，但文明的源头我们决不应该忽视。

一个开放的国家，一个要与世界各国正常交流的国家，应该了解世界；一个身处东方的世界，一个与西方存在着诸多差异乃至隔阂的国家，更应该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和西方的途径很多，其中原创文化的研究或比较研究，是一条最为可行和有效的途径。“它似乎很迂远，真正说来却是最好的甚至是最直接和切近的通途。”^①

^①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4 页。

目 录

前 言	
导 言	(1)
第一章 本原的狂想	(10)
第一节 哲学的前史与自然哲学的兴起	(11)
第二节 米利都学派	(13)
第三节 爱菲斯学派	(19)
第二章 本质的追问	(28)
第一节 毕达哥拉斯“数”的过渡	(29)
第二节 巴曼尼德的“真理之路”	(37)
第三节 芝诺的辩护	(44)
第三章 多元的回应	(47)
第一节 恩培多克勒的“爱恨说”	(48)
第二节 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	(53)
第三节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56)
第四章 智者的启蒙	(65)
第一节 智者运动产生的背景	(66)
第二节 智者运动的代表	(67)
第三节 自然论与约定论	(78)
第五章 大师的时代——“牛虻的叮咬”	(81)
第一节 走近苏格拉底	(82)

第二节 “牛虻的叮咬”	(86)
第三节 小苏格拉底学派.....	(101)
第六章 大师的时代——“理想国”的设计	(105)
第一节 柏拉图的政治理想.....	(105)
第二节 “理想国”.....	(108)
第三节 柏拉图的影响.....	(117)
第七章 大师的时代——“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120)
第一节 思考的一生	(120)
第二节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126)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的贡献.....	(139)
第八章 快乐的追寻.....	(143)
第一节 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和认识论.....	(144)
第二节 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伦理学.....	(147)
第三节 伊壁鸠鲁哲学思想的启蒙性.....	(151)
第九章 禁欲的训诫.....	(155)
第一节 早期斯多亚学派.....	(155)
第二节 晚期斯多亚学派.....	(160)
第三节 斯多亚学派的政治智慧.....	(167)
第十章 怀疑的质询.....	(172)
第一节 古希腊怀疑主义兴起的原因.....	(172)
第二节 怀疑的质询.....	(180)
第三节 怀疑主义的影响.....	(187)
第十一章 基督教的潜入.....	(195)
第一节 新柏拉图主义.....	(195)
第二节 晚期希腊哲学与基督教.....	(204)
第三节 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贡献.....	(207)
参考文献.....	(214)
后记.....	(217)

导言

认识西方文明或西方哲学，首先必须应该了解和认识古希腊哲学，这是孕育西方文明和西方哲学的母体。希腊人堪称哲学的民族，他们不仅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根基，而且提出并探讨了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①就其历史而言，古希腊哲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神话哲理时期（约公元前20世纪—6世纪）、早期自然哲学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5世纪）、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约公元前5世纪—4世纪）以及晚期希腊哲学（包括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期的哲学，约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5世纪左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因此我们必须要简单梳理一下古希腊文明的整个发展进程，这对认识和掌握古希腊哲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古希腊的周边有一片辽阔和美丽的海域，即地中海和爱琴海，这片海域被三大洲所环绕，为沿岸的居民提供了天然良港，在商品的交易中，思想也在不断的碰撞和交汇。同时，地中海东端和南端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也给予了古希腊人创造崭新文明的契机。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希腊文明开始产生了，它并不局限于希腊半岛，而是包括整个爱琴海及其沿海地区。对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6页。

希腊文明首先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克里特岛文明，此岛形状狭长，横亘在爱琴海的南端，就像是通往地中海的一道门户。它的东端和南端与两大古文明中心相距甚近，对其影响就不必说了。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克里特岛的文明突然衰落，但其文明成果却被希腊文明所吸收，它的第一继承人就是亚加亚人，这是早期希腊人中的一支（早期希腊人有三支，即亚加亚人、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尼亚人），他们创造了迈锡尼文明，这是古希腊的本土文明，这种文明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便衰亡了，衰亡的原因可能与外族的人侵有关。人侵的外族其中一支就是与迈锡尼人同属印欧人的多利安人。多利安人好像并没有继承迈锡尼文明，他们没有文字系统，因此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900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段空白，以至于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之为“黑暗时代”。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这场历史变故中，原本与东方文明极其类似的专制制度竟然消失殆尽，后继的文明采用了对西方文明影响极其深刻的城邦制度，这种转变究竟如何发生至今还是个谜。^①就此而论，如果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没有中断，西方哲学能否在希腊产生和繁荣，恐怕无人能够知晓。在这段“黑暗时代”中，尽管没有文字，但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一些传说还是通过了一些吟游诗人的传播而得以广泛流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译《奥德修纪》）。传说两大史诗均是由双目失明的吟游诗人荷马所作，因此人们往往又将“黑暗时代”称之为“荷马时代”。这种流传和吟唱的史诗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考古学家们如德国的谢利曼和英国的伊文思就是根据史诗中的故事发现了特洛伊城和迈锡尼城，当然这些史诗也夹杂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就是在这些神话传说中大量的原

^① 这种转变的探讨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对此顾准在其著作《顾准文集》中有精辟而独到的阐述。除此之外，在浦兴祖主编的《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1页中也阐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黑暗时代”所直接导致的公开的仪式和民间口传的神话故事，进而使得一个垄断政治权力的阶层很难出现。